1. 引言

本文探讨的是普通民众对两种民主观念的理解问题，以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民主观念在不同人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别？

1. 文献综述和理论
   1.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带来民主非线性关系（李普赛特—英格尔哈特—世代）/匮乏和社会假设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稳定与持续，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大多数民主化研究学者的证实和支持。正如李普赛特最初指出的那样，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民主转型，且各国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条道路始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终于政治现代化（李普赛特）。然而，许多学者却提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观念和价值观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格尔哈特在对现代化理论做出系统性辩护时指出，价值观的变化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主要解释机制，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变量 “政治文化” , 即如果经济发展引发民主转型, 它首先要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因此，如果不研究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就很难严格检验现代化理论。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人们的价值观优先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经济成就、物质安全的强调让位于对生活质量、自我表达的强调，体现出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这种对权威的淡化、公平竞争等程序性观念的认可以及对政治参与和自我表现的日益强调。因此，持有和欣赏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是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Coppedge（1997）。英格尔哈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建了现代化理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变量之间, 经济发展高度影响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发达的国家自我表达的价值明显偏高, 反之则否。现代化理论最有力的支持者 Lipset (1994, p. 3) 也宣称，对于民主的前景而言，文化因素比现代化更重要。

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强调国家的宏观发展（例如GDP）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对于解释群体民主取向的更替至关重要：具有传统价值观的老一代群体逝去，被年轻的群体所取代。由于年轻一代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物质保障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世俗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将会在年轻群体中更加普遍。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群体更替将导致这些世俗和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普及率更高。英格尔哈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出发，提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的代际 “文化转移”，此即从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观念的转型。匮乏假设认为，人们一旦在青年和童年时期确立某种特征，那么他们成年时也会继续保持这种特征。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提出，人们在成年的过程中确立的某种固定的优选序列会在他们成年后继续保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未成年的时期确立的，这种价值观的确立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而且一经确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社会化假设是对匮乏假设的补充，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说明了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新老群体之间在优选的价值观上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也就随之提高，同时也会产生较大的代际差异。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两种假设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导出一系列对价值观变革的稳定预测。这两个假设分别关注到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化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前者可以推导出短期变化或阶段效应，后者则可以推导出长期的群体效应。可见，在单个社会内部，大众政治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变化是通过代际替换 (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实现的: 与老一代相比，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物质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而由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成年以后趋于稳定, 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总体上价值观念变化的代际替代效应——随着老一代的离去，社会逐渐由新一代填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发生了总体上的变化。

尽管上述文化主义的现代化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分歧，双方都有怀疑论者和捍卫者，但它仍然是解释大众民主观念的有力工具。如XXX就发现阿拉伯年轻一代对性别平等和宗教多样性更加宽容、对公民自由和选举竞争更加渴望。但也有学者指出，现代化进程不一定会创造出民主导向的公民（Bellin，2002；Kamrava，2005），威权国家通过向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福利待遇，促进了大众对威权领导人的认可和政府信任的加强。如金和周就发现，中国最年轻的一代，即“习一代”， 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较前代更加倒退，威权主义倾向更明显。陈和杨通过对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实验调查发现，互联网在改变年轻一代价值观方面的有效性远大于经济发展。Cantoni 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进行的思政课程改革显著地影响了最新一代学生的价值观。上述研究都呈现出现代化理论在中国遭遇困境，中国仍然是“比较民意研究中令人困惑的异类”。

然而，关于中国公众民主观念变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并未进行长时期的观察，同时也没有探求不同世代之间民主观念变化的差距。尽管吕杰认为中国60年代出生的世代比80年代出生的世代持有更多的监护型民主观念，但该研究只是借用横截面数据

2.2 民主观念

围绕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来组织民主的含义由来已久。从熊彼特（1943 年）到普沃斯基等人（2000 年），民主通常等同于自由公正的选举。在熊彼特的著名论述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黄金标准，而与社会经济和社会特征相关的问题，如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或腐败，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政治进程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民主本身的特征（Collier &amp; Levitsky，1997；Karl，1990;Donnell，2004）。随后，达尔在其著作《多头政体》中确定了定义民主的八个标准，实际上是将民主等同于民主政府的机构和程序。如果公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且选举指导政府的行动，那么这就是民主的本质。这种制度/程序上的选举民主定义通常被接受为民主制度的最低标准。虽然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侧重于政治，但民主的公众形象也可能具有社会层面——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人们赋予民主这个词不同的含义（Canache，2012；Dalton 等，2007；Mattes 和 Bratton，2007），大众对民主的理解是复杂而多方面的（Bratton 等人，2005；Bratton 和 Mattes，2001；Camp，2001；Carrington，2008；Dalton 等人，2007a，2007b；Miller、Hesli 和 Reisinger，1997；Ottemoeller，1998；Sarsfield，2007；Schedler 和 Sarsfield，2007；Shin，1999）。一些分析家声称，发展中国家当代对民主的支持只是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支持。如果民主与富裕、发达的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那么对民主的支持就意味着希望实现同样的经济标准，但不一定是同样的政治标准（Hofferbert and Klingemann 1999；Fuchs and Roller 2005）。T. H. Marshall (1992) 的研究就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专注于经济需求，例如社会服务和普遍福利，而对民主的政治含义缺乏真正的理解。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流行的民主观念对民主的出现和巩固的前景具有重大影响。针对这两种选择——程序/竞争与社会福利——构成了公众对定义民主的主要维度。程序性民主观念强调制度公正性为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对民主所体现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欣赏，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即使在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它也有潜力维持脆弱的政治政权(XXX)。与此相反，功利性民主观念强调治理结果为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公民对民主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政权能够促进提高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公众很可能会屈服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诱惑，以政治自由换取经济发展。例如，克劳德·阿克通过对非洲多少个国家的调查发现，非洲民主运动追求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权利；非洲人民坚持将经济机会、社会改善和社会福利制度作为民主的核心观念。他们认为，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做什么。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并不一定只是单纯持有程序性或功利性的民主观念。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大多以混合方式解读民主(XX)。因此，当我们谈论以民主观念衡量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指的是持有不同比例的混合观点。还应该澄清的是，这两种民主观念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许多民主程序强大的国家也提供了丰富的效用。因此，我们希望将民主观念划分为不同的产品组合：功利性产品组合（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和政治产品组合（包含自由公正的选举、言论自由、制度化的政治权利保护）。如果人们在判断民主时，能够分别且正确地区分一篮子经济商品和一篮子政治商品，认为政治商品似乎比经济商品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可以阐明“程序性民主与功利性民主”的争论。

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年龄、队列和时 期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观察到的趋势。此外,这类研究过分聚焦于时期趋势,而忽视主观幸福感在 其他时间维度上特别是队列上的变化趋势

3. 理论

公民对民主的理解可能会随着时间和世代的推移而改变。公民的民主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由物质匮乏和黄油面包驱动的“腹中政治”会逐渐让位于强调程序和自由的“体面政治”。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年轻一代的公众

出生队列效应可以与时期效应共存这一事实并不直观，而且往往被忽视，但它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经济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人会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粹主义投票现在比过去强大得多

4 方法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队列分析之一，追踪了六个西欧国家民众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分析了从 1970 年到 2008 年几乎每年进行的调查，采访了数十万名受访者。从一开始，年轻出生队列就比年长出生队列更具后物质主义倾向，并且一直如此。队列分析显示，经过近四十年，出生队列仍然和开始时一样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他们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物质主义：没有生命周期效应的证据。因此，代际人口更替带来了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大规模长期转变。但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强烈时期效应也很明显。从 1970 年到 1980 年，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整个人口变得更加物质主义，但随着随后的经济复苏，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有所恢复。在每个时间点，年轻一代都比年长一代（更有可能支持排外政党）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也更有可能支持绿党）。但在任何时间点，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都可能使整个人口更加（或更少）物质主义——也更有可能（或更少）支持排外政党。在高收入国家，年轻的后物质主义选民在任何时候都最不可能支持排外政党，但整体人口这样做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

但在处理代际变化时，必须考虑时期效应和年龄。如果说时期趋势体现了外部因素的瞬时效应，那么队列趋势则反映了外部因素与个体内在发展的交互作用，即外部的历史因素作用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从而对人群产生了分化。因此,我们需要用生命历程的视角来解释这些宏观因素在队列中的效用。要同时估计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趋势效应,并且破除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因素,需要进行APC分析。

对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研究中引入世代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针对中国公众所做的民主观念调查时期都相对较短，通过世代的划分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获得民主观念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势，因而可以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关注宏观因素的历史作用。

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 宏观因素在时期和队列上的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

民主到底是是内在的，基于对民主所体现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欣赏，民主本身就是目的？还是反映了一种更具工具性的算计，即民主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最常见的是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